

序一

追寻新词产生的踪迹

张美兰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

语言不仅仅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代代传承的重要载体和人类认识世界的智慧结晶。语言的发展必将促进文化的进步，而文化的进步，又存在于语言记录的印迹中。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新词新语的产生，不仅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反映，同时它融入了当时的新学和中西文化文化交流的新鲜成分。这是汉语词汇史中新词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莊钦永先生长期耕耘不辍，发表了系列论文，出版了相关的专著，为这个时期的汉语词汇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我有幸得以读到莊钦永先生《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教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的新书稿，莊先生广泛收集材料，利用他精通多种语言的优势和史学研究的功底，对汉语新词做了很好的阐释，令我为之兴奋。莊先生嘱咐我为这本书写一个《序》，晚辈岂敢。在此，将我的阅读感受与读者先交流为快。

早在2010年，莊先生与周清海教授合撰过一本专著《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新加坡青年书局），这是继《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2001年）之后的一本研究20世纪初新词新语的论著。我是通过阅读这本书认识了莊先生，尤其在指导学生进行新词新语研究方面，我从中得到了很大帮助。同时，深感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广泛收集和占有资料，在新词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明清时期中国的西学东渐有两次高峰，一次是明末清初天主教东传，一次是晚清新教东传，两次高峰中，传教士是中西交流、新词创

制的主导方。而东南亚(包括菲律宾、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都是中西交流、语言接触的前沿阵地。但相关资料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1807-1842年)新教传教士资料在中国内地尤难获取,也较少引进。莊先生曾经先后工作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因此,在文献材料收集和整理方面,他能详尽占有文献;他早年致力于东汉历史,其后他专攻新马华人史、新马教会历史、晚清翻译史等研究领域。近20年来,莊先生主攻19世纪上半叶马六甲、新加坡基督新教传教士的出版事业与中文译著,相关的中文代表作有《新甲华人史新考》、《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万国地理全集校注》等。因此,他的研究有史学方面的独特视角和综合方法。他的这部新作《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教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与旧作《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2010年)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新词研究中19世纪上半叶资料的不足。他考证的一些新词,将词的书证年份提前了。如《圣经》中常出现的地名“巴比伦”,在马礼逊1815年的《古时如比亚国历代略传》就使用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汉译,早在马礼逊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米怜在《察世俗·全地万国纪略》中就出现了。这些可以补充《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2001年)、黄河清编著的《近现代辞源》(2010年)、《近现代汉语辞源》(2019年)等工具书及其他学者之考证作品。这丰富了汉语新词史面貌,尤其是提供了新词产生过程中的更多过渡性词形形态,如中国本土不多见的早期使用的“焗机”,这是一个很典雅的新词,“焗”,热气上升。“焗机”即“蒸汽机”。那么,就有了早期的“焗舟”,即“火船/蒸船/火轮船”,今之“轮船”。再如“马尼拉”,英语Manila的汉译地名。中国古籍译称“麻逸”、“麻里嚕”、“麻里芦”、“麻里吕”、“唎喇喇”、“马尼刺”、“蛮哩喇”等。这些新词的收入和考证,有助于考察新词的词形选择及定型过程,有助于明确中国本土所用新词的来源,以及新词早期在东南亚产生和使用,后来传入中国本土的传播过程。

新著《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教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收录了莊先生近年来发表的五篇论文，集中讨论了19世纪上半叶新教传教士资料中的新词，包括传教士马礼逊、郭实猎、米怜、麦嘉缔等人的中文译著及所办中文刊物。首先，作者在进行新词研究时，将新词放在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从政治、外交、思想史等方面以及翻译理论、词汇学等角度综合探讨。正如莊先生所言，词汇是研究历史、政治史、外交史、思想史等领域的重要资源。如第一章选择了少有人关注的“大英（国）”为代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历史的关键词，从历史、翻译理论、文书制度、思想史、词汇学等视角来论析它的诞生、早期书写实践，以及在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人为了使用它与清廷官员所发生的冲突等，填补了晚清翻译史个案研究的一个小空白。莊先生受福柯“话语与权力”观点的启发，敏锐地察觉马礼逊之所以弃“英吉利”、“大不列颠”而以“大英（国）”代之，其“创造性叛逆”翻译蕴涵着翻译者个人的政治思想意识——提升英国在中英外交中的地位；郭实猎大量使用新译名，作为“赞助人”在翻译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暗含着削弱大清帝国政治话语霸权的企图。重视新词产生和使用的历史语境，是莊先生新词研究的一大特色。每一门学科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会与其他学科之间有着这样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新书的价值也不限于词汇史方面，从中西交往、新教东传、汉外语言接触史、翻译史等角度看，都很值得参考。

在本书的第二、三、四章中，莊先生关注马礼逊、郭实猎、米怜、麦嘉缔等的新词创制工作，指出他们在新词创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贡献。从来源来看，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米怜、郭实猎、麦嘉缔等所创的一百余新词，有来自中国人、天主教传教士、之前新教传教士所新创制的词语，也有沿用当时东南亚或中国东南沿海所流行的日常用语。从类别看，最多的是宗教类新词，历史人物和地名等专名，还有地理、政治、天文学、动物、经济、实物等非宗教类新名词。莊先生一一厘清这些新词的“词籍”，强调新教传教士对前人用词的多途径继承。如第三章中，莊先生指出：《察世俗每月

统记传》中的40多个词，并非全是米怜等所创译的汉语新词，有的其实是旧语。莊先生指出：这一百余个新词只有少量沿用至现代汉语，大多数是过渡性词语。但是这些过渡性新词，却为后来创造更精确、更好的译词奠定了基础。这些新词在近现代汉语词汇史上，也发挥承前启后重要角色。

莊先生根据创制方式对传教士中文资料中的新词进行分类，指出传教士在翻译希伯来、希腊或拉丁语词汇成为汉语时，其译词的构词方法与佛教译者所采用的一样。这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莊先生在书中提出：汉语新词溯源工作是一个大工程，是一项长远、永不停止的工作。它需要许多学者的参与和共同努力。这部新作中纠正了已有研究中一些书证偏晚或创制者张冠李戴的错误，论证可信。个别新词溯源还有深究的空间。此外，新作重在新词溯源，较少涉及这些新词在世纪下半叶及之后的演变。但这并非作者立意所在，不能苛求。正如作者所愿，新作无疑为后来学者更上一层楼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文献资料的信息收集、整理越来越便捷，期待有更多后来学者加入这个研究行列，产出更多的成果。

我怀着无比敬佩的心情读完这部新作，备感汉语词汇的博大精深。在语言接触下的新词新语，其来源和传播历程，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新词的产生到最终定型的过程，同时受汉语词汇自身规律的制约，体现了汉语词汇系统的共性特征。汉语新词的探源工作任重道远，我辈还需开拓视野，继续前行。蒙莊饮永先生嘱咐，是为记。

2021年9月